

“一带一路”经贸论坛

# “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扩大 金融机构谨慎对待长期项目

本报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在4月12日,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与世界商会联合会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提出,未来要加强金融融通,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高云龙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势必进一步增长,我们期待各国继续创新国际化、多元化的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资本合作,加强项目对接、能力建设和联合融资,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保障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金融的支持,同时也为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 金融业持续开放给外资银行更多空间

这种商机不仅表现在贷款方面,各种债券、金融衍生品都将迎来机会。

据商务部数据,2013年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推进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的税费是22亿美元,创造就业21万个。

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为金融机构带来了更多机遇。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在上述论坛上提出,“一带一路”为金融机构提出的机遇有四点:

其一是“一带一路”沿线70多个国家,它们是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赖小民表示,“一带一路”沿线70多个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只有7个国家属于发达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差异性比较大,发展中国家就意味着未来有潜力、有空间,有巨大的市场。

其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会拉动相当多的国家巨大的投资,巨大的投资会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产生新的商机。“据有关国家统计,‘一带一路’将来会有大量的资金需求,大量的融资、基础设施都会给我们提供新商机。

这种商机不仅表现在贷款方面,各种债券、金融衍生品都将迎来机会。”赖小民如是说。

其三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相关业务机会。

其四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产生新需求。

这种机会不仅针对中资银行,外资金融机构也迎来了发展机会。

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上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新加坡大华银行区域业务兼外国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张志坚表示:“我在中国金融做了10年,外资银行初入中国时,市场曾担心是‘狼来了’,如今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比例还是非常低。因此,这回中国对外开放金融业,市场准入放宽,对于外资银行来说肯定是好事。”

在金融合作方面,张志坚认为,现在最大的机遇有可能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张志坚以东盟为例,东盟现在每年至少需要2000亿美元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东盟政府、当地的资本是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不仅是银行。我觉得要有效结合各类金融机构,可能需要一个有效的平台,整合协调各种资源。”张志坚如是说。

## 对长期项目做好全面评估

金融讲究的是通过风险可控、成本可算、利润可获,进而达到收益跟风险成本的匹配,但在这个问题上会碰到许多挑战。

机会与挑战并存。谈到“一带一路”中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赖小民提到了4个“不”。其中,他再次提到了70余个参与国家。

其一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即在70多个国家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诉求、价值理念,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千差万别,这种“不平衡”状况,就会带来很多工作中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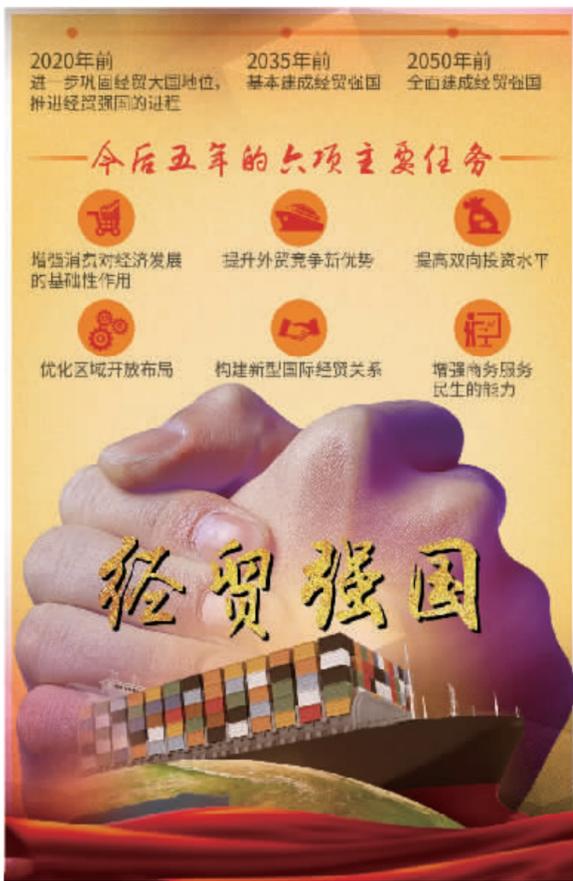
其二是“不配套”,即金融产品和服务不配套,特别是这些国家有大量投资需求,却严重短缺金融资源,尤其是金融产品的创新远远跟不上。

其三是“不协调”,要加强境内外外的协调,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宗教、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

其四是“不完善”,主要是制度方面,如法律制度。

赖小民提示道,金融讲究的是通过风险控制,成本可算、利润可获,进而达到收益跟风险成本的匹配,但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会碰到许多挑战。

他举例称,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需要大量的投资,大到几十万亿元,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单纯依靠政府是不够的,如何调动政



## 相关链接

### 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为了有效发挥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要以市场化原则发挥地缘、成本、规模、配套和政策支持四大优势,整合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资源。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运用开发性金融,助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项目回收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等特点,开发性金融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推动商业性银行开展网络化布局,为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配套金融服务。无论是促进贸易融通还是更好服务对外投资,均需要加快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提高对贸易的金融服务能力,形成金融和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进而盘活资金棋局。

第三,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与社区银行、互联网/电信支付为代表的普惠金融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有助于保证金融市场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第四,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这有助于有效动员当地储蓄,降低换汇成本,减少汇率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

第五,进一步推动股票和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股权、债券融资市场的连通性,通过发行长期稳定的债券筹集稳定资金,包括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能够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样和不同期限的金融服务。此外,股权投资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杠杆作用。

部分摘自媒体报道

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怎么样创造和使用更多基金、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产品?赖小民认为,特别是在“走出去”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些想清楚。

“我们必须很好地评估风险,还有不同的融资方式。”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楚钢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有很多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要很好地评估项目风险,评估在经济上的可行性、融资可行性以及长期可行性,同时还要能够抵御中短期的流动性风险。且在合作伙伴关系中,不仅需要善意,也必须要合理地分配责任,有相应的权责制,还要有协议及相关法律保护。

# 博鳌热议中国扩大开放三大重点

本报记者 李艳洁 博鳌报道

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可谓备受瞩目。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更是因为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将宣布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措施,阐述中

国将如何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在博鳌较为受到关注的进一步开放领域包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改革等。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对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华美国企业最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为他们争得一个公平的商业环境和对等(互惠)市场准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对《中国经营报》记

者表示,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的两个核心包括,一个是人民币自由交易,也就是把人民币改革为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内可自由交易的国际型货币,这个是我们基本的目标。第二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北京会晤经济成果吹风会上传出信息,中国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在该措施实施三年以后,外资投资比例将不受限制,可以达到100%。此外,还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对于保险领域,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这说明在金融领域,外资将享有国民待遇。”吴晓求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的两个核心包括,一个是人民币自由交易,也就是把人民币改革为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内可自由交易的国际型货币,这个是我们基本的目标。第二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就是说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不过,这一决定目前尚未实施。刘向东解释,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前的一行三会变成了一行两会,机构调整完成后有望实施。

下转 A6

# 热爱“购买”的中国: 海外投资回归理性

本报记者 李艳洁 博鳌报道

随着“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的海外投资规模上升迅速。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对外投资只有10亿美元,2015年超过1400亿美元,2016年超过1700亿美元,2017年在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对外投资仍然超过了1200亿美元。

商务部统计显示,除了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增长快速外,对外投资并购活跃,2015年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2016年1072亿

美元,2017年962亿美元。

购买力“惊人”的中国让美国和欧洲感到恐惧,并且相继提出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加强审查。美国政府在3月23日更是提出,将出台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但是对于全球的商人和投资者来说,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来自全球包括中国的投资者都认为,中国的投资正在回归理性,而理性的投资将给接受投资的地区带来好处,因此破除误解和担忧势在必行。

## 欧美“围堵”中国海外投资

3月23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财政部将在两个月内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投资提出限制意见。美国媒体认为,这一限制主要针对中国国企和主权财富基金。此外,美国国会也在讨论是否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CFIUS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改革也许会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

去年,欧盟也提出对来自中国国企的,在高科技、基建等敏感领域的投资、并购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称,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扰乱市场”。

对于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是否真的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或者扰乱了市场,泰丰资本CEO Andrew Geczy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是因为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投资准入规定有差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关心的是“对等”投资。而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多年来不断发声,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

Andrew Geczy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发展非常快,投资规模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而某些特定的行业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都是比较在意的。

据商务部的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并购领域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18个行业大类;2016年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197起和109起,占我国境外并购总数的26.6%和14.7%;2017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20.8%、15.9%和8.6%。

“最近达成的投资并购协议,三分之二是中国民企完成的,三分之一是国有企业完成的,但是额度和规模上,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Andrew Geczy表示,航空、通讯、基础设施等都是大部分国家包括欧洲比较关注的行业,此外还有一些企业被中国企业并购后带来了就业损失,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就业和国家利益,因此才提出了加

强审查或者限制措施。

地中海俱乐部总裁 Henri Giscard d'Estaing 表示,欧洲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比较担忧,中国政府可能没有很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因此导致欧洲甚至全球有一些不理性的恐惧,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对于投资威胁“国家安全”、知识产权等说法, Henri Giscard d'Estaing 认为,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肯定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欧洲也有其他问题要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多次提到过,“需要外国投资来刺激就业发展”。

来自澳大利亚的FMG集团副董事长 Mark Barnaba 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对外国投资有相关的法规和审议机构,对于跨国投资,每个国家都会考虑社会因素,这一点可以让公众了解政府做出的决策,这是有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

面对全球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政策收紧局面,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表示,全球化带来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如果现在走了10步,那么遇到问题,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向前再走10步。“问题是现在不是退回一步,进行讨论和调整,而是退回到原点,否定了整个全球化。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矛盾,比如投资贸易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平衡,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正确的选择是正视、检讨问题,绝不能从10步退到0步。”

对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 Henri Giscard d'Estaing 和 Andrew Geczy 都认为,这种政策变化不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但是,“这种调整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公众的认知,要遏制那些认为中国投资会破坏就业等错误的观点。中国需要解释清楚投资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好处。这样的投资是能够带来双赢的。”Henri Giscard d'Estaing 认为,应该告诉公众中国的变化,中国很快将有4亿人口的中产阶层,对全球的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我相信我的公司会从中受益”。

屠光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有助于形成更好的共识,纠正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问题,继续推进全球化。

## 中国海外投资回归理性

对于去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的下降,屠光绍认为,这说明中国的投资主体更加理性。“前几年增长很快,但是有很多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比如战略不清晰,不知道投资和企业发展有什么关系,或者战略不明确,投资方式不是很有效,投资没有达到目的,投资前后的管理不健全,这样的案例很多。”

屠光绍认为,2017年的投资行为中,越来越多是与企业自身发展相关,投资的产业和领域,也不再是盲目的乱投资。“海外投资更理性更健康了,将来可持续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尽管2017年中国海外投资规模下降到1200亿美元,屠光绍认为这个体量还是很大,说明对外投资的需求还是很多。

Andrew Geczy 认为,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对外投资不仅是规模的问题,也需要智慧来管理这样的资本。“中国回归审慎和理性的投

资政策是比较明智的。”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名誉顾问、前会长氏家纯一认为,过去中国海外投资增长非常快,可能有一些不理性的投资也很正常。“海外投资的增速这么快,会对资本外流带来一些压力,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回归审慎和理性是非常健康的做法。”

氏家纯一介绍日本的对外投资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大量投资都流向美国、英国等地,不理性地投向房地产,最后又低价卖出;现在日本的对外投资慢慢地回归到核心的业务领域,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技术研发能力。

“很多人说未来1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会增加到中国GDP的2倍,我想中国会慢慢地增加海外投资,这种投资会改善全球的供应链。”氏家纯一表示。